功德园 人物37 ——许传音

■编者按:在雨花台功德园,长眠着很多科学家、艺术家和老革命家,他们的名字也许您并不熟悉;天文、土壤、古生物、化工、物理、水利、航天、音乐、绘画……他们工作的领域对我们来说似乎有些陌生。但就是这样一群人,为我们生活的时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发现》周刊联合雨花台功德园共同推出"人物",为您介绍这些风云人物的传奇故事。

许传音(1884-1971年):安徽贵池人,13岁到南京求学,1905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前身汇文书院,并获得农学士学位。1915年获庚子赔款留学基金资助,赴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读书,在该校获经济学(铁路管理方向)博士学位。1919年学成回国,从事铁路方面工作,曾担任湘桂黔专员、铁道部营业司司长等职。1937年12月4日,受邀参加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持安全区难民的住房安排工作,还应邀担任世界红卍字会副会长。1938年2月18日,成为国际救济委员会中唯一的中方委员,利用其特殊身份与西方友人四处取证。1946年9月,作为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见证人赴东京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后担任鼓楼医院(教会医院)副院长。1971年病故,享年88岁。

许传音:东京审判庭上一个重要的中国证人

11年前,在南京大屠杀66周年前夕,现代快报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寻找大屠杀见证人许传音》,这则启事刊登当天被许传音的孙女许以眉看到,随之,一个南京大屠杀重要见证人的身世之谜被揭晓。

在此之前,很多有关大屠杀的史料中都提到许传音,他曾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世界红卍字会工作过,并且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出庭作证的重要证人,因为他的证词,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和松井石根的罪行有了铁证。但许传音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后来去了哪,却无从知晓。

近期,现代快报《发现》周刊记者再次采访了许传音的孙子许以立,听他讲述了祖父的传奇一生,并见到了那份许传音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的珍贵资料。

现代快报记者 戎丹妍

许传音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 本版图片均由许传音之孙许以立提供

从小接受西方教育,13岁来到南京求学

许传音,字澄之,1884年10月6日生于安徽贵池,父亲许郁斋是当地一个教会的管理人员,许传音从小也生活在教会里,因天资聪颖,深受教会工作人员的喜爱,他们还教他读书认字。在许传音13岁的时候,他被送到南京求学。

1905年,许传音毕业于金陵大学的前身汇文书院,并获得农学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长达10年,并于1915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许传音获得庚子赔款留学基金资助,到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17年6月,许传音在该校获得经济学(铁路管理方向)博士学位。1919年,许传音学成回国,先在津浦路办事,后在北京政府铁道部工作。

1928年,许传音来到南京,仍然从事铁路方面的工作,曾担任湘桂黔专员、铁道部营业司司长等职。在南京落脚后,许传音便举家定居南京,并在峨嵋路7号至9号修建了两栋二层小洋房,过上了悠闲的日子。

但没多久,抗日战争爆发,并很快逼近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时,许传音因家产都在南京,且已上了年纪,便没有跟随前去。南京大屠杀前夕,许传音将妻儿老小送回安徽老家避祸,自己则利用与在南京的美国人的关系而留在南京,以便保护家产。

大屠杀期间,边安置难民,边收集日军暴行证据

1937年12月4日,许传音受邀参加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持安全区难民的住房安排工作,并把自己的两栋洋房也拿出来安置难民。当时,许传音他们共建了25个难民营,收容了约20万到30万的难民。

因为许传音的英语好,而当时的世界红卍字会又没有人通晓英语,为了与安全区西方人士及时沟通,许传音还应邀担任世界红卍字会副会长,协助红卍字会工作。

因此,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许传音的工作非常忙,一方面,他要协助西方人士一起阻止日军暴行,记录日军暴行并汇总到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便向日军当局抗议。另一方面,要协调世界红卍字会赈灾和掩埋尸体的工作。

在安全区档案和拉贝日记中,有10余个案例是许传音提供的记录。如安全区档案中的第153个案例:"12月25日,15岁的姑娘李小姐被日本军官和2名士兵从鼓楼新村的住所劫走。"其落款人为许传音。

有时,许传音也陪同美国牧师马吉一起到日军施暴现场去拍摄证据,如新开路5号夏淑琴一家的惨案就是许传音带马吉去拍摄的,马吉的这些电影胶片后来也成为南京大屠杀的唯一活动影像。

一度感到工作做不下去

每天面对同胞被惨杀,许传音也一度感到工作做不下去。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许传音就留有这样的对话:"南京陷落第三天,我才获得日本军事官员的许可绕城转转,由一个日本人在车上陪着我。此行的目的是统计在街头和房屋里的死尸。我可以看到尸体遍布,有些尸体遭到严重损毁。有些像刚死去前一样躺着,有的屈膝,有的身子蜷缩着……种种迹象表明,这是日军的所作所为……沿着主干道,我开始数死尸的数目,自己就数到了500具,我看没有必要再数它们了,我做不下去了……我还算幸运的——在车上有一个日本人的陪伴——他是一个会讲中文的日本人。有无数次,我险些被拉下车来,而这个日本人帮了我……"

一方面要面对无数死难同胞,一方面自己也深受死亡威胁,在这样的水深火热中,许传音一直默默地坚守着这座城市。

1938年2月18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被迫取消后,在宁西方人士成立国际救济委员会继续原来的工作,许传音应邀担任委员会成员,他是国际救济委员会成员中唯一一位中国人。

对那些同样在为中国人奔波救助的西方人士,许传音也心存感激。许传音曾两次主持难民感谢西方人士的活动,一次是1938年2月21日,在得知拉贝要回国后,许传音等人代表难民和各难民收容所所长联名写信感谢并挽留拉贝,信写得情真意切,催人泪下。

另一次是同年3月17日,许传音等人在宁海路5号国际救济委员会总部举行仪式,代表南京难民向所有在大屠杀期间救助中国难民的西方人士赠送了"华丽的丝绸和缎面的画卷"。

舌战日军律师,有力证词将松井石根送上绞刑架

因为许传音的特殊身份,目击了许多日军的暴行,战后,已经62岁的许传音作为主要证人前往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全程用流利的英语回答检察官的提问,并和日军战犯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伊藤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在有关外国人建立安全区的问题上:

伊藤问:"安全区的建立是不是和这有关系呢,即外国人惧怕从南京撤退时遭到中国军队的袭击?"许传音答:"不,和那没有任何关系!你在指责这些善良的外国人,这样不对。你知道他们出于人道主义精神才建立了安全区。这对于中国人和日本人来说都是有关系的,这个词——人道……你一定要理解这点:12月在南京并没有很多的外国人……"

在有关难民营里有无中国兵的问题上:

伊藤问:"证人,你今天早上说难民营里没有中国兵,是吗?"

许传音答:"是的。我也说过,国际委员会的准则是不允许持械的军人进入难民区,除非缴械。"

伊藤问:"你知道溃败的中国兵逃亡时经常假装普通老百姓吗?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乔装为便衣士兵。"

许传音答:"可能有。在他们积聚力量进行公开抵抗前,我们会把他们当成普通老百姓。假如不是,那他们就是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

因为许传音的有力证词,对审判松井石根和日军罪行起到了重要作用,最终松井石根被送上了绞刑架。

晚年一直住在南京峨嵋路9号,靠出租房屋为生

1945年抗战结束后,许传音被委任为鼓楼医院(教会医院)的副院长,一直到1950年代初。后因年事已高,许传音退休在家,一直居住在南京峨嵋路9号,靠出租房屋为生。文革期间,80多岁的许传音也受到冲击,许多珍贵资料被烧毁。

1971年9月24日,许传音去世,子女将其骨灰安葬在黄金山公墓,后来又将其墓迁到雨花台。

家人眼中的许传音

许传音(右)和家人在老家

许传音(右)与家人在峨嵋路9号

许传音与孙辈合影

留着山羊胡,嘴里会不自觉地冒出一串英语

许传音有三儿一女(其中一子早夭),大儿子许德匡(1966年4月25日去世),二儿子许先德(现定居美国),女儿许正平生活在重庆。

许以立(许先德的长子)告诉记者:"爷爷后来从未跟家人提起过南京大屠杀以及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的事,我们也是在2003年《现代快报》刊登了那则寻人启事后才知道,爷爷曾是个很不一般的人。其中南京师范大学的张连红教授和美国华裔历史学者胡华玲女士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有关爷爷的故事。"

据许以立介绍,生活中的许传音是个脾气倔强又古怪的老人,大家都喜欢称他为"许老头"。他生活独立,妻子早逝后,基本都是独自料理自己的生活,直到去世前几年才由两个在南京的孙女许以慧和许以眉顺带照顾。这种生活方式和许传音从小就接受西方教育有关,现在也成了家里的一个传统,子女长大后都是独立生活,和父母各管各的。

"文革"期间,因为房子被没收,许以立的父母不得已又回到峨嵋路9号,和许传音生活在一起。也因此,祖孙三代过上了难得的大家庭生活。这段时间,许传音含饴弄孙,经常带着许以立等孙辈到南京各大公园游玩。在许以立的记忆中,爷爷许传音留着山羊胡,穿着长大褂,经常不自觉地就冒出一串英语,有时还会教孩子一些英语单词。